




从东方到西方

——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

● 孟长勇 著

 复旦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编 中外文学比较

- 《屈原》与《李尔王》美学品格比较 3
- 论延安文艺对外国文学的借鉴 19
- 中国文学在日本、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 33
- 用异国音符唱故乡之歌
——中亚东干族文学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49

第二编 20 世纪中国文学

- 双璧互照辉相异
——鲁迅与瞿秋白杂文风格比析 65
- 挣断精神的罗网
——论祥林嫂的反抗性 74
- 论瞿秋白的文学党性原则理论 81
- 周作人早期的文学观 103
- 20 世纪前期现代小说发展述略 112
- 论延安文艺的开放精神 134
- 琅琅诗声激延水
——公木延安时期的诗歌创作 144
- 从民间到“圣坛”
——《东方红》诞生的前前后后 163
- 延安文艺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联系 172
- 暴露·反思·进取
——新时期开拓阶段小说述评 183

从《人生》到《平凡的世界》	232
面对群山唤巨灵	
——评长篇传记文学《群山》.....	244
试论机智人物的喜剧特征	255

第三编 外国文学

薄伽丘喜剧意识与《十日谈》艺术表现	269
《十日谈》：一面高扬人性的大纛	282
看似平淡实奇崛	
——读维克多利亞·瓦尔坦的一组小说.....	293

后 记	303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编

中外文学比较

《屈原》与《李尔王》美学品格比较

1942年1月,郭沫若以“历来所未有”^①的泉涌妙思,著成他成就最高的史剧《屈原》。1605年,莎士比亚饱蘸忧愤,写成他著名的悲剧《李尔王》。由于两部剧都取材于古代,都是为了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,都属于悲剧性的诗剧,尤其剧中的主人公,都有非常相似的长篇抒情独白,所以,有人在《屈原》一公演时就说,《屈原》很像《李尔王》。

郭沫若自己也曾谈到:《屈原》与《李尔王》“相似得令我自己都感觉着有点惊讶”。但他也深自庆幸,在写《屈原》之前,不曾读过《李尔王》。倒是“三十年前读过兰姆的《莎翁本事》(林纾译《英国诗人吟边燕语》),向暴风雨愤怒的一段大概也是有的吧”^②。郭沫若于此承认了两个剧的相似之处。然而,却绝不是有意识模仿《李尔王》,毕竟他读过的只是兰姆改写的故事而非原剧。当然,即使如此,他也对故事感受到“无上的兴趣”,无形间给他以“很大的影响”^③,强烈触发了他的艺术兴奋点。因此,三十年后,还能在一种不自觉状况下唤醒内心世界深藏的积累,以接近的形式喷吐迥然相异的情愫。

在比较文学领域,有人从思想内容或艺术表现方面来比较

① 《我怎样写五幕史剧〈屈原〉》,见《郭沫若选集》第3卷上册,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

② 《〈屈原〉与〈厘雅王〉》,见《郭沫若选集》第3卷上册,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这里要指出的是,郭沫若谈的《莎翁本事》为英译本,是兰姆据莎翁戏改写的二十则故事。后来林纾与魏易将此译为《英国诗人吟边燕语》。参看戈宝权:《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》,载《莎士比亚研究》创刊号,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。

③ 《我的童年》,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,第114页。

分析《屈原》与《李尔王》，通过比较寻觅两者的相似乃至相同。但这种比较，充其量只看到郭沫若怎样向莎士比亚学习，却看不到郭沫若比莎士比亚高明之所在。笔者以为，既然是比较不同时代、国家、民族及不同风格作家的作品，由于各自社会经历、历史传统、人文背景、地理环境以及审美心理结构不同，所以，即使相似或相同处再多，也是同中有异、形同神异。因此，本文拟从作品整体的美学品格上比较《屈原》与《李尔王》，比较其同中之异甚至两者的高下来。

—

一部优秀的作品，其美学价值往往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、包容的思想内涵、负载的历史或现实性的命题，以及为完成主旨进行艺术构思时的总体精神。

历史剧《屈原》(1942)，诞生在中国现代史上最暴虐黑暗的年代。日寇肆意践踏中华大地，国民党对外妥协，对内镇压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皖南事变”，举国上下，激愤难抑。郭沫若把“这个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去”^①，为人民奋笔疾书，写下了中国戏剧史上光华灿烂的不朽诗篇——《屈原》。剧作反映了当时国统区的时代风暴和社会黑暗，极力彰扬正义，鞭笞邪恶，塑造了一个时代性的悲剧主人公形象——屈原。

悲剧《李尔王》(1605)产生在资本积累的“羊吃人”时代(资产阶级为做羊毛生意，圈地养羊，把农民逐出田园，使其饥寒交迫，由流亡而至暴动)。《李尔王》真实地揭露了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贪婪、残酷。和《屈原》一样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时代的风暴情绪，也力图伸张正义、控诉邪恶，同样塑造了一个悲剧性主人公形象——李尔王。

^① 《我怎样写五幕史剧〈屈原〉》，见《郭沫若选集》第3卷上册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

可以看出,《屈原》和《李尔王》在揭露社会黑暗、反映时代呼声、塑造悲剧性主人公、张扬正义、鞭挞邪恶方面是颇为相似的。不仅如此,两剧在为完成主题而进行艺术构思的总精神上也是相同的,即借古喻今,通过历史事件和人物,表现和影射当时社会现实。特别是在借古喻今时,不拘泥于古事,认为“历史的事实并不一定是真实”^①,而要“失事求似”^②,在把握历史总精神的前提下,对史实予以合乎情理的重新阐发,对人物性格予以“合理的发展”^③,甚至还虚构些人物与情节出来。

《李尔王》根据同名旧剧改写。在旧剧中既没有葛罗斯特和他两个儿子的故事线索,又没有李尔王暴风雨控诉的情节。在贺林希德主编的《英格兰编年史》卷二中,李尔王复国后还统治了两年,死后考狄利亚又统治了五年。然而,为了写出时代的悲剧性这历史的精神,莎士比亚就重新阐发李尔王的命运,改其个人历史为悲剧结局。同时,虚构了暴风雨场景,突出对社会之黑暗的否定。虚构进爱德蒙形象,加强对现实中唯利是图、利己主义人际关系的暴露。

史剧《屈原》取材于战国历史。不过,屈原被南后诬陷、怒斥张仪及其“雷电颂”诗等,都不是历史上曾有的事。但这些虚构有助于突出主人公屈原的坚毅性格和崇高气质,合乎历史总的精神。历史上的宋玉,是对辞赋发展有贡献的作家,剧中把他写成“没有骨气的无耻的文人”;张仪是对中国统一有功的人,剧中有意把他写得相当坏;婵娟史无其人,为了发展屈原,作者虚构她做屈原精神的女儿。这些重新阐发或虚构都是对历史精神的合理发展。很明显,在为反映主题而进行艺术构思时,《屈原》和

① 《我怎样写〈棠棣之花〉》,见《沫若文集》第3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,第168页。

② 《历史·史剧·现实》,见《沫若文集》第13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,第17页。

③ 《献给现实的蟠桃》,见《沫若文集》第13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,第58页。

《李尔王》都把握了不拘旧有、以失事求相似的原则,达到了为完成主旨进而为现实服务的目的。

尽管在主题思想以及艺术构思基本精神的大方面,两剧颇为相似,但再具体一些考察,则可发现相同之中有差异,两者还往往是在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迥然有别。

《屈原》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去把握历史精神,揭露抗战时期国民党丧权辱国的罪行,反对分裂、主张团结、抨击黑暗、歌颂光明,表现了屈原自始至终爱祖国、爱人民、坚定不移为实现崇高政治理想而斗争的精神品质。而《李尔王》是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把握历史精神,揭露资本主义人情浇薄,反对非人道的背叛,主张人道的“和谐”,暴露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人际关系。通过李尔的转变过程完成了作者希望的道德完善,表现出唯有君王“人性复苏”,社会才会国泰民安。两剧相比,一个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反映现实;另一个以人文主义思想感受现实。一个站在政治的高度,爱祖国、爱人民,呼出民族的心声;另一个立足伦理的层次,爱自己、爱父亲,评判道德伦理的是非;一个抨击黑暗,歌颂光明,要在彻底毁灭邪恶的同时求得新生命的诞生;另一个诅咒现实,却在对社会的小否定中求大继承。两相比较,主题的起点自然是《屈原》高些。

尤其需要指出的是,《李尔王》中有着作者因思想和时代的局限而摆脱不了的宿命色彩、天命观(如五幕二场中爱德伽说:“人们的生死都不是可以勉强求到的,你应该耐心忍受天命的安排”);而《屈原》则充满着积极战斗、乐观自信的进取精神(屈原向往光明,与恶势力斗争不屈,“脚镣手铐我并不感觉痛苦”,“倒反而增加了我的力量”)。《李尔王》局限于个人的恩怨情仇,伸的是一己之正义,控诉的是与自己为敌的邪恶;《屈原》则拥有民族的开阔视野,张的是爱祖国的凛然正气,抨击的是祸国殃民的丑类。《李尔王》以人文主义的“爱”为内容写李尔王对自己的爱,考狄利亚对父亲的爱,属于一种狭隘的“情爱”,最多也才写到道德完善了的李尔同情人民;而《屈原》写主人公对祖国、对人

民的爱,婵娟对民族以及民族精神的化身——屈原的爱,属于有广泛意义的“仁爱”,它具有一己之“情爱”所不可企及的博大和无私。很显然,《屈原》比《李尔王》思想要进步,内涵要深广,境界要开阔。

二

《屈原》和《李尔王》都是悲剧,悲剧的美学倾向必然包含悲剧所呈现的意义。从悲剧意义上讲,两剧也表现出了相同中的许多不同。

《屈原》和《李尔王》都显示了主人公所处社会的腐败、衰弱,显示了现实龌龊使自己的意志、愿望不能实现,显示了丑恶势力的横行、猖獗,正面力量的暂时失败。在两剧中,有价值的被毁灭了,屈原遭贬谪流亡,婵娟牺牲,李尔死灭,考狄利亚为父殉情,他们所面临的邪恶势力实在太强大,两剧的悲剧意义在于都表现出了悲剧的时代性。

不同的是,《李尔王》的悲剧意义,在表现了一定的悲剧时代性的同时,还表现出一些性格上的悲剧性。主人公李尔,其悲剧命运在相当程度上与他的刚愎自用、横蛮暴戾、糊涂愚蠢的性格弱点分不开。而屈原,自始至终刚正不阿、坚贞不渝,他的悲剧性不在于他的性格有什么缺陷,而完全在于所处的时代。

显示《李尔王》悲剧美学意义的还有考狄利亚的为“情爱”而死。考狄利亚实而不华,对父亲有着真挚的“情爱”,然而她的“情爱”由于两个姐姐唯利是图巧取宠、父亲喜好恭维不重实而不得实现。这就构成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悲剧性冲突。她的“情爱”代表着普遍的“人”的要求,具有人文主义理想美的价值。她的为父殉情自然就作为美的毁灭而显示悲剧意义。这里,她的“情爱”属于个体的、一般人的普通层次。她的死,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同情、怜悯、惋惜。而屈原,并不是一般怀才不遇的文人,他是一个与国家、人民共忧患,有远大抱负及理想的诗人兼政治

家。他崇正义,尚真理,坚持抗暴以卫祖国。他像坚强而圣洁的柱石,为了国家的存亡,头顶黑暗的重压,呼唤着光明和胜利。然而,他被淫威压败了。“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,不仅是楚国的悲剧,而且是我们民族的悲剧!”^①他的悲痛和愤怒,倒不是因他的人格受辱,而是因理想受辱,是他所代表的爱国力量的失败以及由此导致民族灾难所引起的。这种情感属于那个时代具有共同政治立场的人们所共有,而非仅仅他一个人的。这情感摆脱个体,代表整体,因而具有时代的气度、崇高的品格。其崇高,就在于将小我化进大我,将个体融进整体的“无私”,由此而产生的博大,使生命获得了永恒性。屈原以及婞婞,有着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,有着明确的英雄主义的生命价值观。他们认为,能为整体利益而败而亡,正是个体的荣幸和永生。正因为如此,人们才对他们命运的失败或死亡绝少怜悯和哀伤,多感壮烈和崇高。把个体的生命换作有价值的整体利益的存在,那是英雄的壮举、正义的胜利、崇高美的完成。而这,正是《屈原》在悲剧意义上高出《李尔王》的地方。

三

戏剧非常讲究人物。剧中人物怎样行动,决定着情节怎样发展。而悲剧中的人物性格,往往关系着悲剧的整体品格。也就是说,《屈原》中的屈原、婞婞,《李尔王》中的李尔、考狄利亚,他们各自性格的建树和层次,在一定程度上就显示着作品的美学意义。

屈原被贬谪流放,婞婞饮毒酒就义;李尔疯狂致死,考狄利亚被缢身亡。他们都是忠良,而命运却都是悲剧。就命运的形式而言他们是相同的,但就人物性格的起点、所达到的高度、性

^① 《论古代文学》,见《沫若文集》第12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。

格层次的丰富性看,两剧就大不相同了。

屈原是人民意志的代表、民族精神的化身。剧中性格虽有一些发展,但无大的质的变化,从始到终馨香、净朗、崇高、壮美,闪耀着夺目的光彩。而李尔王开始暴戾骄横、刚愎自用,让人感到憎恶,后来生活的变故使其人性复苏,良知发现,对人民有了体恤之心,这才让人感到怜悯和同情。可见屈原性格比李尔性格的起点要高些。就思想水准而论,屈原始终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,为整个民族说话,甚至到最后,其反抗精神突破忠君思想的局限,成为一个反君权、反神权的叛逆者,其思想达到了进步民主主义的高度。而李尔置国家、人民利益于不顾,据一己之好恶,随便把社稷交付别人,直到最后也才稍微同情人民,有了人文主义的色彩,其思想充其量只能达到人文主义化的个人主义。还有,婵娟是响当当的屈原精神的女儿,继承了一种为国为民而献身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传统。“我爱祖国,我就不能不爱先生。”显然,她对屈原的爱,除去个人伦理的色彩,主要蕴含着深刻的爱国主义的内容。而考狄利亚只能算作李尔血缘上的女儿,她继承的是人伦长幼的传统,她对李尔的爱,完全基于报答养育之恩,属于个人伦理的范畴。比起婵娟来,她思想性格的起点、达到的高度都要明显地低一筹了。

人物性格在抒情性很强的作品里,常常由人物感情来体现。所以,《屈原》和《李尔王》这两个同属浪漫主义、都重情感表达的悲剧,性格层次丰富与否,从情感层次上也完全可以看出。屈原与婵娟的感情,可以用“仁爱”来概括。而这“仁爱”起码具备三个以上的层次:伦理道德层次(长幼、主仆、师生之爱);思想认识层次(正义、真理之爱);社会政治层次(祖国、民族之爱)。这三个层次的融合和浑然一体,使他们的感情显得厚实和丰富。而李尔与考狄利亚之间的情感,只能用“亲情”概括。这“亲情”基本上只到伦理的层次(长幼之爱),至于思想层次(真理、正义之爱)几乎达不到。所以,他们的感情层次显得不够丰富,不够高。如果再从情感类别、性质上看,屈原和李尔更不相同。屈原有纯

洁、高尚、庄严、正直、耿介、悲愤、崇高等情感，而李尔只有专横、骄奢、自负、哀伤、怨恨、失意等情感。屈原和李尔同样被逼得一度精神变态，然而屈原是快到真狂的临界而努力支撑着建设自己，李尔却是处于疯癫中一味诅咒别人、与恶同尽。

除了主要从情感考察外，人物身份所体现的性情的丰富程度也大不相同。屈原显然有至贞的秉性、圣洁的人格、渊博的学识、坚定的主张以及崇高的抱负和理想，集进步政治家、诗人、思想家的素质于一身。而李尔仅仅是一个失却了王位的国王而已，除了一己的私利、人文主义化的个人要求外，余者又为何物呢？

四

人们谈及《屈原》和《李尔王》，最多提及也是感到最明显相似的地方，是两剧都有刺激性很强的长篇抒情独白——风雨雷电场景中的抒情。两者同样是因环境压迫而形成感情的巨大冲动。“同样的是临到了要发狂的境界，同样的以自然元素拟人而向之发泄愤懑；同样在怨天恨人、骂神骂鬼。”^①同样语式和气势的独白，同样场面和气氛的抒情，又是同样以外在自然界的风暴衬托主人公内心的风暴。这些艺术表现的形式像极了。然而，从表述的内容、抒情的意境、激愤的性质和强弱上来考察，则就大不相同了。

李尔的激愤，是他听不进逆耳忠言，终被两个女儿逼得走投无路，于是向风雨雷电发出的求救的信号。屈原的愤怒，是因坚持爱国而受冤，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，发出的挟雷霆电般正义的吼声。

试听屈原之声：“你们风，你们雷，你们电，你们在这里暗中

^① 《〈屈原〉与〈厘雅王〉》，见《郭沫若选集》第3卷上册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

咆哮着的,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,你们都是诗,都是音乐,都是跳舞。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,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。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,阴惨的宇宙,爆炸了吧!爆炸了吧!”

“雷!你轰隆隆的,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?……我要和你,和着你的声音,和着茫茫的大海,一同跳进那没有边际的没有限制的自由里!”

“啊,电!你这宇宙最犀利的剑呀!……也正是我心中的剑。你劈吧、劈吧、劈吧!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、劈开、劈开!”

气势贯通如烈马下山,一奔而不可收;饱蓄着的地心岩浆终于找到吐口,喷薄而出;如回响九天的炸雷,摧枯拉朽的疾风,愤情欲燃,激情欲裂,与大自然诸力相合,势撼山城,声吞五岳!一首夺魂震魄的诗,一曲雄壮瑰丽的歌!对风、雷、电的歌颂,昂扬着激奋的高亢。与风、雷、电的同化,把生命的呐喊、感情的张力几乎扩充到极限。这种激愤的强度、抒情的意境无疑是非常高的。

再看《李尔王》:“吹吧,风啊!胀破了你的脸颊,猛烈地吹吧!你,瀑布一样的倾盆大雨,尽管倒泻下来,浸没了我们的尖塔,淹没了屋顶上的风标吧!你,瀑布一样迅速的硫磺的电火,劈碎橡树的巨雷的先驱,烧焦了我的白发的头颅吧!你,震撼一切的霹雳啊,把这生殖的、繁密的、饱满的地球击平了吧!打碎造物的模型,不要让一颗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遗留在世上!”风、雨、雷、电,“我站在这儿,只是你们的奴隶,一个可怜、衰弱的、无力的、遭人贱视的老头子。可是我仍然要骂你们是卑劣的帮凶,因为你们滥用上天的威力,帮同两个万恶的女儿来跟我这个白发的老翁作对。啊,啊!这太卑劣了!”

李尔所倾泻的是个人的恩怨,所要惩罚的是丧尽天良的女儿。他只能把忧愤倾诉于风、雨、雷、电,向大自然讨饶求助。这里,只是撕心裂肺的哀歌、失去自信的怨曲。和前举“雷电颂”相

比,前者对黑暗取挑战态度,要在毁灭中求光明,后者对现实只是诅咒,对丑恶的抗争唯有守御;前者和雷电同调,引以为知己,显示时代精神的高扬,后者与风雨疏离,视之若神明,显出个人情绪的无力;前者视雷电与神相异对立,向神权发出抨击,后者将风雨和天神混同,自己无奈才向上苍索援;前者是一个刚烈不屈、堂堂正正的高大形象,表达光风霁月的品格、长存天地的浩气,后者以一个气衰力朽、蹒跚踉跄的孱弱形骸,发出临死前让人伤怜的呼救;前者是“主持自己”坚毅的豪迈战歌,后者是“自承衰老”^①的悲怆亡音。如此种种,两剧之高低,岂不了了分明?!

五

熟悉《屈原》和《李尔王》的人,都能明确感觉到两剧从头至尾弥漫和贯穿着一种葱茏、浓郁的诗意。而且两剧都选择和构思了一批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,这意象“浮动”其间、流走其中,使剧本的抒情性加强,浪漫主义特征突出。

《屈原》和《李尔王》的诗情,不仅表现为诗的语言、诗的抒情,而且还表现为诗的意境、诗的情节和诗意化的人物。这是因为,郭沫若和莎士比亚既是剧作家同时又都是诗人,他们早年的创作也都是从诗歌起步。诗人的气质、写诗的思维习惯和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在剧作中表现出来。何况《屈原》主人公本身就是诗人,莎士比亚剧也都是用诗写成的。所以我们不难看到,《屈原》中主人公对《橘颂》的诠释、高尚人格的阐发、“雷电颂”的独白,对婵娟的颂词以及幕后《礼魂》之歌,《李尔王》中弄人的谣谚、汤姆以谐寓庄的“训谕”、李尔的“暴风雨”独白,无一不是诗的语言、诗的抒情、诗的意境。而且两部剧各自整体的推进,都是以叙事诗般的意境演化的,构成剧的重要情节也都是诗化了

^① 《〈屈原〉与〈厘雅王〉》,见《郭沫若选集》第3卷上册,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

的情节。屈原为婞婞举行葬仪,《橘颂》是香韵盈盈的诗,用晶红的朱砂写在洁白的绢上,由伟大的诗人高高举起,在正义之火焚烧黑暗的庙堂时,庄严地盖到婞婞的身上。这是多么沁人心脾的诗情画意啊!《李尔王》里葛罗斯特经剌目得知汤姆等的悲惨生活,发出彻底民主的呼声;经落崖未成,学到勇于承担人生苦难而达到圣哲的精神境界。这又是多么深蕴的诗化的情节!尤其显得相像的是两剧还都塑造出极富诗意的人物。《屈原》着意塑造了优美人格、“诗的魂”^①——婞婞。《李尔王》精心刻画了善与美的化身——考狄利亚。屈原本身就是诗人,把诗人的气质写得透彻,就把人物无形中诗意化了。李尔虽是国王,最后能转为同情人民,看到邪恶崩溃,自己与之同尽,超然瞑目,这本身也是把人物诗意化了。

还有,《屈原》和《李尔王》都大量运用了象征意味的意象。在剧中,人们都会感到剧情充满着冲击、抗争、紧张的气氛,有时会觉得紧张到很痛苦的地步,而且几乎意识不到这种感觉如何由于一系列普遍存在的“浮动”的意象而得到加强。这种有魔力的意象,究其根底则都是关于剧中人物心理的、精神的以及形体上的痛苦。屈原被诬陷不能言,被革去左徒遭嘲笑,扯去云冠,解下长剑,被押进大庙险遭杀身之祸。而李尔,受两个女儿嫌弃虐待,理不能伸反遭嘲弄,流亡风雨地愤懑而死。两剧中意象同样都带来主人公形体和精神上的痛苦。然而,象征意义却彼此有别。怀王废左徒,命囚禁屈原,南后令关押婞婞,这象征着君王及其亲属本身就是法律。婞婞死,屈原奔汉北,象征民族精神永生与真理长存。李尔及考狄利亚死,寓意人文主义对人性、人道理想的破灭。爱德伽赤身裸体,暗示回到人的本色,摆脱了社会偏见的束缚。在《屈原》里,浪漫主义诗作者创造了自己所喜爱的恬静橘园、辉煌内庭、受辱发愤的东皇太乙庙以及风雨交加

^① 《〈屈原〉与〈厘雅王〉》,见《郭沫若选集》第3卷上册,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

的雷电怒吼；《李尔王》则运用了浪漫派“黑色剧”想象所喜用的荒城、茅舍、旷野、风暴、神秘可怖的场地和月下耸立的岩石。屈原着素衣、白巾，喜橘树，作《橘颂》，就是被废黜也还套着花环，象征着品性纯洁，情操芬芳，“努力撑持着建设自己”^①；李尔“头上插满了恶臭的地烟草、牛蒡、毒芹、荨麻、杜鹃花和各种蔓生在田地间的野草”^②，象征着自暴自弃的狼狈，自承衰老的脆弱。如此象征，两剧中还有很多。总的比起来，《屈原》中的象征多显明朗、亢奋、崇高，而《李尔王》的象征多显神秘、灰暗、沉郁。前者给人以振作与警策，后者让人感觉颓唐和压抑。

六

戏剧中的人物语言，是构成戏剧之美学品格的另一重要方面。因为任何人物性格情感，很大部分都是依凭语言来表现的。

《屈原》和《李尔王》两剧，在人物语言上都鲜明地表现出浓厚的夸张性、哲理性色彩。两剧的作者都采用寄情于物的手法，将人物感情化为联想、幻想中的形象，并用夸张的语言描绘出来，从而使形象气韵和特征更为突出。《屈原》的“雷电颂”、《李尔王》的“暴风雨”，其中独白是最典型的夸张性语言，它们对风、雨、雷、电作了生动形象的夸张性描绘。同样，两剧语言的哲理色彩也尤为浓郁，往往能以精炼的话道出富有哲学味的深刻见地，揭示出隐藏在事物内部的规律，具有高度凝聚力、概括力。屈原对宋玉、婞婞关于人生观的阐述，《李尔王》中弄人、佯疯的爱德伽口中之言，简直是上乘的语言、绝好的哲理诗，妙语连珠、含义深蕴，达到令人抚掌击节、叹为观止的程度。

然而，两剧的人物语言在个性化特征上却显出巨大的差异。观《李尔王》，其中六个伦理高尚的正面人物，语言都长时间有同

① 《屈原》与《厘雅王》，见《郭沫若选集》第3卷上册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

② 《李尔王》，见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第9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。

类中任何人都能说的话。内容、口气、句式甚至韵律都是一种模式,很难单独辨清哪几句是这个而不会是那个说的。诚如托尔斯泰批评的,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,说的常常是千篇一律、刻意求工、矫揉造作的语言。虽然这话似有绝对之嫌,但从《李尔王》看,基本上是切中肯綮的。相反,和《李尔王》比起来,《屈原》中的人物语言个性色彩却要突出得多。剧中子兰调戏婵娟不慎跌倒,当婵娟怜悯而扶起他时,他颇洋洋得意。屈原一上场,他又故作可怜,反诬“婵娟欺侮我,她把我摔翻了,还骂我‘跛脚骗子’”。这话活现出纨绔公子的无赖特征。宋玉在做屈原弟子时其言极恭,屈原刚被废黜,他便言辞大变,“就是先生的文章,也有好些我不好佩服”。最后,他竟诅咒屈原“活着有什么好处”,表示“我已经决心跟随公子子兰进宫”。这些话活脱脱显出宋玉骨子里的势利。就是言语不多的怀王,在内廷呵斥屈原几句,也尽显出他刚愎自用、颀顶骄横。常识告诉人们,语言是否个性化,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作品的艺术风格。通过分析可知,在语言个性化方面,《屈原》比《李尔王》要优越和突出。

七

一部作品的美学品格,无疑由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所决定。但是,一旦作品投入社会,就必然要与欣赏者建立起对应的审美关系。作品所昭示的现实和历史意义,在欣赏者内心所激起的审美呼应,虽然不是作品之品格本身的构成因素,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说明作品美学品格的高低优劣。

1942年春,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,国统区的人民被压迫得透不过气来。也就在这个时候,《屈原》应运而生,首先在浓雾垂天的重庆上演,一出台便场场爆满。每演到“雷电颂”时,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屈原(金山饰)几乎融为一体,众口一词,掷地有声,全场爆发出狂涛似的掌声。那时,整个山城都轰动了。国民党极尽谩骂、诬蔑之能事,妄图缩小《屈原》的影